

治史体悟

陈启云文集

一

陈启云 著



◇ 南开大学国际多元文化综合研究所丛书

治史体悟

陈启云文集

一

陈启云 著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南开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治史体悟: 陈启云文集. 1 / 陈启云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5633-6762-7

I. 治… II. 陈…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872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明秀西路 53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5.5 字数: 367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5 000 册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啓者老弟大隆來函已悉此是君係
 弟一卦弟弟仍留美國
 弟之弟港定在何時却為念所接者
 再為教涉及甚大近人在勞而用心
 折也甚少惟其月內能難得有官誦華
 弟勿感寂寞此深入以求他年之大
 然則玉盼不何依林以清素港必及
 想弟當有詳設校需不知
 弟等助之間多有契合處念及此下
 時風雷變真不知從說起此
 順詢此祺
 穆啓 月十日

钱穆先生致陈启云信函（二）

（一）西曆八月十四日

此信係由陈启云先生转交，原信已由陈启云先生转交，原信已由陈启云先生转交

此信係由陈启云先生转交，原信已由陈启云先生转交，原信已由陈启云先生转交

六六六

不意其後隨前接來字函因體況不佳
 有因湯錫予先生紀念編又集作序一事
 稍遲即下筆當便可先走後止問
 接書云 弟為不獲采台一晤深感
 先後幸常有來函俾悉為以釋
 率復不詳順公函
 旅社穆啟
 內需業疾收
 丁月二十一日
 (1981)

钱穆先生致陈启云信函（三）

楔 言



承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美意,我把过去十年写的学术论文编为文集二册。另外有十二篇论文已收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03),不再编入。还有数篇四十多年前的旧作亦一并编入本集。集中有几篇文章是以英文撰写在西方发表,自英文中译。这些中译论文的注文,仍按原西方汉学著作的体例,所引的线装书、数码的先后次序为[卷数]:[页数][每页上、下版面,A=正面,B=背面]。全集各篇文章的注只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详列书目及相关资料,以后从略。

代序之一：寻道·求真

我在1960年以香港新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身份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Harvard-Yenching Fellowship)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在红尘滚滚的东方世界觉得灵泉沉浊,希望到西方学术净土接受严格的训练,获得学理上的突破或超越。我的原意,在西方居停四五年,完成博士学位,便返回东方。不料学无止境,真理堂奥也永远在追索之中。就这样,在西方度过了三十多年学习、研究、教学生涯。

1980—1981年,我从美国回到东方,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莫庆锵讲座”教授;那时有几位当地史学界同人先后不约而同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研究历史?”我的回答是:“追求真理。”那时,这几位史学界同人,有些不以为然。其中一位,在过了十几年后和我在美国相遇,则对我说他大半生研究历史,主要是在追求真理。这已是“白头宫女”的遗事了。对现在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而言,真理不但是不存在的,而且是没有价值的,甚或是害人的。不过我说的是“追求真理”,而不是说真理是现存的、可以获得的;至于不存在的甚至不可获得的真理,怎样去害人呢?害人的恐怕是人自己,是人的不当行为(包括对真理不当的态度)。

我心中的真理,早年的源头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道;不过由于灌注了对历史的体认,所以我心目中的道是不断地发展演进的——从先秦的道论(思辨的演进),到汉唐的道统(文化传承),到宋明的新道统(道学、理

学、心学),到清代的汉学(考证、实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入的新史学,到历史认知在20世纪中、末叶的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从宗派信仰(包括特定的宗教信仰或文化传统)和哲学理论而言,这些“道”“理”是断裂而不相容的;但从人文演发和历史认知的立场看,这些“事”“理”则是一体连接或互动的(这是广义的辩证认知思维)。这是我数十年来个人求知历程的真实体认。

近代西方对中华思想文化有两个影响深巨的理论:一是中国思想传统缺乏知识论的关注;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真理观念。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亦即我在加州大学任教的最后十年,我与西方学者对这些问题不断地论辩,因而对这些问题研究论析投入了很大的关注。在一些西方的华裔学人看来,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从个人在西方的学术生涯来看,的确如此。但至少这显示了我个人对“道·真理”的坚持。在我看来,我是坚持追求真理的立场,去追求关于中华思想里的道的真理内涵或真理价值。这说明了,我自1994年以来在台湾“清华大学”教古代中国思想史很重视中华传统思想的知识论基点和真理内涵和价值的原因。

对“道·真理”追求的坚持,正是引领我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不断游走于东、西二生命世界的主要原因。

(原刊李远哲、萧新煌主编《杰出学者给年轻学子的67封信》,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本文部分采自本人在陈复《慎子的思想》中的《赠序》,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

代序之二：梁启超的体悟

启云按：此文是四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用英文发表的著作。由美国纽约市重要基督教华人布道机构的周如欢牧师中译，刊在《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林治平编，台北：宇宙光，1977）中。周牧师对文中严厉批评西方帝国主义者和基督教士的话，能忠诚地译述，客观地去理解，对学术真理的尊重，甚为难得。我的史学研究是由钱穆师启发的，但我对历史的理解却是从阅读梁启超的著作启蒙的。我把这篇比较通俗的周译文字作为自序之二，一则感念任公对我的史学启蒙；二则缅怀自己当年的青春意气；三则深叹百年前任公之所见与我今日之所睹何其相似。

本文研究自 1891 年，特别是 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至 1897 年戊戌政变前夕，梁启超与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交往关系。文中分析在此数年间，梁氏从盲目崇洋而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作有批判性的选择接受之心路历程，并指出梁氏在早期对西方传教士所代表的文化讯息中，已经能够分辨其现代学术文化、西方宗教传统及成见、西方列强在华之已得利益和需求，三种不同成分。此体认对梁氏于民国初年从政与治学的立场与贡献，有很大的影响。

1898 年 8 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发动的政变失败。对逃亡者不

尽不实的报道,带给外界对 1894 年至 1898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一个错误概念。观察家淋漓尽致地描绘中国仍是极端保守的社会,这未免太幼稚。事实上,自从败于日本国之后,中国人故有的民族自信和威望即受到致命的一击。中国知识分子痛苦地感到突然被推进黑暗的角落。他们寻找曙光的引照,纵或这光是从西方透入的。

1895 年以前,广学会印行的书刊从不被重视,现今却出奇地畅销,以至驻上海的美国总领事在 1896 年请求中国政府禁止许多牟利商人所非法翻印的书刊出售。康有为在其自传中也论及 1898 年间,西方的书刊已在北京出罄。1895 年 9 月至 1896 年 2 月 25 日,广学会的总干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访游北京,受宠若惊地被北京的官绅们欢迎。而广学会发行的《万国公报》在此时也畅销中国各地,《万国公报》的主编林乐知(Young J Allen)的大名不胫而走。

梁启超于 1896 年 8 月,在上海出版《时务报》,广受欢迎,数月间销路达 12000 份。城中人对维新运动反应热烈。甚至极为守旧的学者诸如叶德辉、王先谦等也订阅梁启超的报刊。直隶总督荣禄,一个顽固的满洲的贵胄,不单谈起并且支持其总辖的天津城的维新运动。据说慈禧太后若不是怒于光绪剪辫子和烧祖先牌位之举,她也会容忍维新运动,因为她对冯桂芬的著述甚感兴趣。

形成上述现象大概有数种原因:基督教传道的影响;西方帝国主义入侵所引致的屈辱;中产阶级出现而加于经济的压力;官僚作风之腐败;一些人的热烈鼓吹以及各种特殊因素。这些因素互相作用,共同为基督教的传教士铺路,使之能影响中国老百姓的顽固思想。

本文的主旨乃在研究传教事业在成果上对中国社会的得失。有关方面的资料差不多全在基督教传教士的记录上搜集引述。从中国书籍上搜获的则为凤毛麟角。一些中国学人不单否认维新党人曾跟传教士有接触,甚至批评基督教的传道工作。为求客观地明察实情,本文将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探讨。

本文将以梁启超为研究中心——一个受传统教育的学人如何响应传教士所带来的新知识体系。他接受的及拒绝的是哪一方面? 什么心理因

素使他愿意被影响？他对新文化的态度，他的态度与同时期学人的差异何在？除梁启超外，谭嗣同以及其他人的态度也将有所涉及，这样才能衬托梁启超的真实。

第一章 预备时期

第一节 广学会的战役

在此无法把传教士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完整地报道，而只能将广学会对 1890 年间维新运动的影响稍加探讨。广学会乃于 1887 年由爱尔兰合一长老堂的牧师威廉森 (Reverend Alexander Williamson) 创立，并与 1884 年在苏格兰建立的中国书报社合并而成。他的目标是“透过基督教的观点，用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著书立言，借此教育人民，特别针对中国的有识之士和官员”。

早在 1877 年，中国的传教士曾就中国高层社会分子对基督教敌视的态度而在上海召开会议。结果林乐知被选为五位代表之一，由他们撰写一篇《基督教的宣言》来向中国高等知识分子表白立场。1890 年春季，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大会，李提摩太在大会中发表一篇论文《基督教传教事业与中国政府应有的关系》，文中提到“中国政府最近印行一本所谓‘蓝皮书’者，用以中伤基督教会及曲解基督教义”，他个人深恐这本书一旦流行民间，必掀起反基督教的热潮。为求对策，一个七人委员会便成立，其中包括林乐知和李提摩太二人，他们被任命书写一篇辩护文，向中国政府解释基督教的教义与精神。日后，李提摩太更广泛地与中国高层分子接触，诸如张之洞、李鸿章、翁同龢、恭亲王、孙家鼐、刚毅等人。

1891 年，威廉森死，李提摩太接任广学会总干事之职，获得浸信会传教机构的支持。任职后，李氏订定目标在向一些中国高层人士、教育官员、大学教授及为数约 44676 位学人施行新文化教育。他提议七项计划：（一）出版高水准的定期刊物；（二）发行有关教育与宗教对工商业及各行业的意义的小册子；（三）征文论及“强国之道”的比赛，冠军颁予重奖；

(四)借讲课、建立阅览室及在博物院的宣传等提倡新文化;(五)在各地的考试场及首都放置并销售广学会的书籍;(六)尽力游说中国政府设立学社,提高教育水准;(七)把广学会的宗旨向外宣传,特别在各地文人荟萃的考试场所宣传,使其影响广远。

1905年,李提摩太草拟广学会的计划书,名为“未来的政治家”,书中强调广学会的工作方针当指向中国的文人学士,因为他们将是社会上极重要的一群。

因此,广学会就遣派众差会的传教士们,在各都会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举人试场上派发书册。事实上,早在1870年,广学会还未成立之前,李提摩太跟其他传教士们已有此举。那时他们所派送的就是1877年上海传教会议,林乐知等人代表书写的《基督教宣言》,还有一篇由上海一位中国基督徒执笔的《照心镜》。

从某些中国人的资料记录来看,这方法十分有效。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康有为的回忆录,都不自觉地承认他们的维新思想多少是受了某些洋书的影响。而这些书册乃得自试场失意的归途上。虽然如此,梁启超却讳言是基督教的刊物。1884年至1894年,十年间谭嗣同先后六次在北京及河南参加考试,但均落第。1880年,他已开始跟其他友人大谈西方学术。可是,在1894年之前,传教士们所分发的书册仍不被文人们广泛地接受,除了他们派发的时间不合宜之外,强烈的宗教色彩也是原因之一。梁启超遇见康有为之前,仍厌恶传教士们欲施的影响。谭嗣同仍持守传统,西方只是低等野蛮民族。明显的现象就是湖南政府出版了所谓蓝皮书来与传教士的书册分庭对抗——“1891年李提摩太在传教会议上提及的蓝皮书,是湖南政府为反击基督教书刊的派发而出版。”

打击引出改善的需要。传教士们领悟到断不能写太宗教化的文章,乃要透过中国的本土思想来发挥,并且慢慢地潜移默化。广学会的成立包含了这一目标。《万国公报》的创立便为一例。1868年9月,林乐知出版了一份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周刊,名为“教会新闻”,订阅者只限于教会分子,结果即因订户过少而在1872年停刊。因此教训,林乐知“承认一份具有西方科技知识而同时渗透基督教教义的刊物是有其必要的”。当时

很多传教士也有同感。于是,1875年,《万国公报》便应运而生。公报的内容“包括从《京报》摘录的新闻,有关中国各地及世界的新闻,尽量适合中国人的阅读口味”。1876年,一份有关科学的刊物《益智新报》也随之出版,《万国公报》在1887年至1888年曾一度停刊,后由广学会支持复出为月刊。复刊后,内容也旨在带给中国官员及文人们对西方文化及基督教一个正确观念。《公报》日渐畅销,成为国内外订阅的报刊。康有为的自传中有言,在光绪九年(1883),他曾订阅《万国公报》,使他对西方文化更加了解。既然这是唯一提及的西方刊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必曾影响他。

广学会另一个文化影响力乃得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博士(Dr. T. E. Faber),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出版有德文、英文及中文等著作。1890年的传教会议决定请花博士站在基督徒的立场论述中国文学。花博士写了一本《自西徂东》的巨著。书内广泛地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作比较。比较的幅面从文学古书、史纂、哲学以至于赌博、鸦片、杀婴等,无不涉猎。此书首次在香港发行,后由广学会出版,甚为畅销。

1892—1893年,李提摩太着手翻译麦西(Mackenzie)的《新史揽要》(*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在1894年——中国败于中日战争的前夕——完成。序言上,他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造成中国在过去六十年来备受外强的侵占与屈辱?他的回答是:“神利用火车、汽船、电讯等交通工具来拆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围墙,使能四海一家和平共处。清政府却从起头就顽固地闭关自守。此一顽梗之举,不单触怒各国,更是违背天意。因此招致天罚,屡受羞辱。既然知道顽梗的自守态度乃失败之因,中国政府就当改善,接纳邻国。如此中国不难成为强国。”

这样的回答糅合着宗教与科学。1890年间维新党人康有为和谭嗣同的论述中也带有此等混合色彩。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极力主张四海一家。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呼应;序言内,谭氏强调一切阻拦四海一家的障碍都当消除。

中国在1894年中日战争失败的耻辱带来传教士们传教的良机,特别是向中国的士大夫们。早在战争之前,李提摩太和林乐知已警告中国政

府若以它的落后来对抗先进的日本国是不智之举。战争的结果应验他们的预言。他们更可以具体地发挥言论。由此,《万国公报》便大大地增强了影响力。林乐知在报上发表数篇关于中日战争的文章和报道,引起有政治热忱的中国学人的兴趣。应读者要求,此等文章后来辑为小书《中东战纪本末》,在1896至1897年间由广学会发行。书中有数章论及日本的教育与进步,林乐知更以他应验的预言和战败的惨状为借口,大谈中国革新的必要。在康有为的回忆录中,他承认向广学会购买书刊,特别是有关日本明治和苏俄^①彼得大帝的书册。

长久以来间阻基督教文字与社会的墙终于被推倒。李提摩太忆述:“基督教的文字工作在过去八十年中备受中国人藐视,所出版的书籍被他们随意抛弃、焚烧。中国的书店商人无论如何不肯售卖基督教的书籍,用以表示他们对国家的忠贞。因着麦西的《新史揽要》以及其他广学会书籍的出版,自1895年迄后,中国的书店商人才改变态度,因为他们能从出售广学会的书籍中获利。”林乐知的秘书和《万国公报》的编辑蔡尔康,在1898年的《广学会年报》上也发表说本来在1893年广学会的售书收入是8000元,但在1898年却超出18万元。

1923年,广学会在其38周年特刊中发表一篇文章,论及康有为和梁启超之所以倡导革新,乃受广学会出版文字的影响;又言民国的成立也是他们影响之所致;并且说他们的书籍是当时唯一包含现代知识的文字。这样的高言近乎过分乐观。因为梁启超和一部分近代政要都否认广学会和传教士们的上述言论。事实上,就是在革新运动的高潮,他们也曾拒绝接受李提摩太、林乐知和广学会部分同人的建议,认为太过武断而不可实行。

第二节 传教士给予梁氏和康氏的影响

对于基督教传教士们的态度,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三人有着显著

^① 编者按:“苏俄”应改为“俄国”,今不作改动,具体原因参见本文后“附识”。

的差别。他们的差异只在于个性的不同，而不是政见的分歧。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就是同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中国古文化的教育。

康有为是受教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精古博今；并且能以其所学来发挥、支持他的政见、理想与学论，圆融通达。一如中世纪的欧洲，中国需要一种能维系政府与地方官绅的领导力。中国政府因此设立所谓恩科乡试(Orthodox Teaching)，用以鉴别地方官员的资格。日子久远，一种矛盾的现象出现在政府的墨守成规和民间实际的需求之间。当西方的军事经济力量冲击着中国的现况时，这矛盾更为突出。因此便产生两种现象：(一)政府不能人尽其才；(二)革新者无法适应传统。

康有为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学者，却也是一位崇尚维新的学人。可能就是这种思想造成他屡次落第(1870—1895)。康有为革新的思想始于1888年10月5日至11月4日试场的失意。他惊人的言论引起北京政府强烈的反对，甚至欲逐其离京。与洪秀全在1836年的失意情形一样，这两种打击促使康有为要向宗教寻求慰藉。1898年政变失败，康有为避难香港时曾对《中国邮报》的编辑说：“他革新的思想乃受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的影响。”后来在其自传中更证实他在香港时(1879)曾购买西方书籍，又在1882至1883年间在上海大量阅读。梁启超说此等书多属宗教或科技类。在其屡赴试场中，康氏必定接获分发的书册。因此，广学会还未成立，传教士们分发的书册已影响着这些不满现状的年轻的一代。

谭嗣同亦不违例。1884至1894年间的参试，谭氏必定接触传教士们所派的书籍，虽然他在外表上仍然强烈地反洋，却在言谈间不离西方学术。他极为崇拜墨子的博爱精神，并且企求研究这理论。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他写了一篇《圣言》，论述所有西方的文明乃受墨子言论的影响。

1893年，谭氏再度失意试场，返河北途中遇傅兰雅(John Fryer)，谭氏从他手中获得广学会的书册。中国因中日战争所受的耻辱大大改变了谭氏对基督教的态度。1895年夏季，梁启超在北京面晤谭氏后，说谭氏“迷于西洋学术”，又“崇尚耶稣的伟大，忘掉孔子和佛祖的德范”。

传教士们对梁启超的影响似属间接。他在四五岁时祖父便教其四

书、古诗，六岁时父亲教之以五经、《史记》。1884年考取秀才生员。1887年入取于广东的学海堂，专研汉学。学海堂乃由广东省督阮元创立，阮元乃负盛名的学者。1889年，梁氏年方十七，便考取举人。成绩出奇的优良，以至于考官李端棻有意将其妹嫁与梁氏。梁启超的成就如日中天，那时候他除了八股文、《汉书》之外，根本没有意识到还有更精湛的学术。

1890年，梁氏落第于京试。归途中获得一本由徐继畲在1840年编纂的世界地理纲要《瀛寰志略》。日后在梁氏的自传中，他承认非常喜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几本翻译洋书。可是他并没有购买。梁氏仍然拒绝受传教士的影响。

1890年9月14日至10月13日，梁氏在广东与康有为面晤。梁氏回忆说：“1890年秋季，我与学海堂的名弟子陈通甫（卒于1895年）交友。他对我说：‘我曾拜访康有为，他的学问叫我佩服。他是一位良师。’我请陈通甫引见于康氏为徒。那时候我傲视自己的学问。可是，与康有为一谈之下，我所学的汉学古文被他批评得不值一文，我如当头棒喝，无地自容。我们的谈话由早上九点延至晚上九点。第二天，我开始求学于康氏。他便教我以陆九渊、王阳明、史纂和西洋学术。自是我便弃学于学海堂，转事康氏为师。”

借着康有为的教授，传教士们的影响也间接施与梁启超和陈通甫。康有为的教授侧重于“融会着宗教与科学知识的儒学”。1891年，应梁启超与陈通甫要求，康有为在广州的长兴里设立万木草堂。有关康有为的授课，梁启超有言：“老师每天授课四至五小时。教授每一课题时，他必详尽地把该学说的源流讲解，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优缺点。之后，他必用西方事例来比较或评论。结论时，他融会个人的意见来批评古今中外学术的好坏。”这样的教授法在康有为的自传中有一例：“光绪十八年（1892），我指导弟子们实习《仪礼》十八章。我为他们预备各式古代乐器……结果发现古笛太长，我们无法用手指按吹。突然间，我领悟到古代的人必定是巨大伟人。因为那时候刚为盘古初开，气温高热。两千年后，太阳与地球的距离日远，气温降低，人的体积也随之缩小。因此，我们可以想像，再过两千年，人的体积必比我们更小，今日的笛对他们也无法适用。”这种混合着